

向善的朝圣

——《耶稣的童年》中西蒙的伦理困境与救赎

罗昊, 彭青龙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240)

摘要: 库切新作《耶稣的童年》不仅将其对主人公伦理困境的关注焦点由前期作品中的社会成因转向个人内在道德缺失, 且在更深层次上突出了唯我主义的人类畸形伦理与向善的真实不断朝圣这一救赎方案。小说实际描写了西蒙的伦理成长过程, 即由最初为惯于臆想他人的唯我思想所迷惑, 至此以后由自身伦理反思引发的对他人的关注, 最终得以尊重他人主体性, 不断趋近善的真实。

关键词: 《耶稣的童年》; 库切; 伦理; 唯我主义; 爱欲; 性欲; 神秘因素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7)01-0053-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7.01.010

The Pilgrimage to Good: Simón's Ethical Predicament and Redemption in *The Childhood of Jesus*

Luo Hao, Peng Qingl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ly published work *The Childhood of Jesus*, Coetzee not only shifts his focuses on the protagonists' ethical predicament from social causes in previous works to individual inner moral deficiency, but highlights solipsism as a human abnormal ethics and the constant pilgrimage to truth of Good as the way of redemption. This novel actually reflects Simón's ethical growth process, namely, from being puzzled by solipsism, with its core being Eikasia, then paying attention to others through ethical reflections, and finally to respecting others' subjectivity and constantly approaching the truth of Good.

Keywords: *The Childhood of Jesus*; J. M. Coetzee; ethics; solipsism; eros; erotism; mystical elements

库切 (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 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 曾获 2003 年诺贝尔文学奖及两次布克奖, 其新作《耶稣的童年》(*The Childhood of Jesus*, 2013) 以平实的笔调对人物心

理展开了深入刻画, 讲述了难民西蒙 (Simón) 带着幼童大卫 (David) 在寻母之路上发生的一系列荒诞而神秘的故事。有论者分别从库切晚期作品对前期作品的自我引用^[1]、好客伦理^[2]、父亲在孩

收稿日期: 2016-11-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16ZDA20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澳大利亚现代文学批评史”(12BWW037)

作者简介: 罗昊 (1994-), 男,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澳大利亚文学。E-mail: luohao_USL@sjtu.edu.cn

子的教育中扮演的角色^[3]等视角对该小说展开研究,为后来者开拓了十分有益的研究思路。然而,如果仅运用上述研究思路,则文本中诸多关键问题无法得到充分阐释。西蒙在文末随伊妮丝(Inés)和大卫踏上逃亡之路时的伦理状态与其初至诺维拉时有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何处,又缘何产生?西蒙在安娜(Anna)、埃琳娜(Elena)、伊妮丝三位女性身上表现出的爱欲和性欲及其变化与这种变化有何关系?西蒙为何仅依靠自身直觉即认定伊妮丝为大卫的母亲?西蒙与工头阿尔瓦罗(Alvaro)关于唯一世界与可能世界的争论透露出了什么信息?而大卫怪诞的读写方式及对数字的神秘认知又说明了什么?欲阐释这些问题,则必须把握库切在文中展现的对唯我主义思想这一人类伦理困境的深入挖掘以及将向善的真实不断朝圣作为伦理救赎之道的呈现。艾丽丝·默多克认为善即尊重偶合无序的世界,关注他人的主体性;追求善就是为了善本身,而不是为了善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并且必须明白追求善本身是没有结局、没有收获、永远不会成功的^[4]。本文将从进化论伦理的覆灭、爱欲与性欲的较量以及神秘世界中的觉醒三个共时维度展开,探究西蒙的向善朝圣之路。

一、进化论伦理的覆灭

小说伊始,西蒙即不断宣扬进化论伦理,展现出典型的唯我主义者形象。在列维纳斯看来,唯我思想的核心是将自我视为除自我之外一切的本源,自我决定并理应为后者所服务,从而造成了“对他者的遗忘与压制”^[5]。担任码头搬运工的第一天,西蒙便向工头阿尔瓦罗建议以吊车取代人力运送粮食,以提高工作效率,把精力用在更好的地方。然而,后者不仅当即拒绝,反而感到十分荒谬:“效率提高十倍有什么意义?”“更好的什么地方?还有什么比供给人们面包更有价值的事儿吗?”^{[6]16}。西蒙虽缄口不言,心里却依旧坚持自我常规的价值判断:使用吊车总比让人像负重的牲口那样扛东西更好。西蒙的碰壁在于其陷入了臆想他人的陷阱。臆想与想象完全不同:后者的目的是追求对世界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而前者则是以自我为中心,依据自身的狭隘思想虚构出有关世界和他人的幻影。此时的西蒙正处于这种虚幻状态中,倾向于通过臆想审视外部的世界,即以自我为中心曲解外部世界,产生不符合事实的判断,以及与之相对

应的偏执和臆想。

与阿尔瓦罗关于“可能世界”和“唯一世界”的争论是促使西蒙伦理反思的起点。西蒙比较了自己所服务的二号码头较其他码头在工作环境方面的优势,不禁感慨:“在这个码头,在这个港口,在这个城市,在这片土地上。所有这一切,在这个可能是最好的世界里是最好的”^{[6]47}。然而,阿尔瓦罗却否认这是一个“可能世界”,认为这其实是“唯一的世界”:不管这个世界是不是最好,都不由人来决定^{[6]47}。西蒙由此初次感悟到,在这个唯一的世界里,人要做的不应是“冷嘲热讽”,而是努力让自己适应这个世界。世界充满着偶然性,不存在一个涵盖万物的完美的总体性意识,正如默多克所言,“艺术必须有形式,而生活不需要”^{[7]285}。世界是由自我与除自我外的一切构成的,唯我主义者把自我视作世界的中心,视作绝对自我同一性基础上的自我主体,企图同化和压制自我之外的他者。然而,西蒙通过自身身处的“唯一世界”意识到他者无法为我所同一和规划,从而在向善的朝圣中迈进了重要一步。

这次觉醒并不意味着西蒙从此不再向个人的进化论伦理臆想屈服,他的向善之旅还有一段路要走。在这段路上,还有一场重要的争论,它使西蒙的唯我主义思想进一步淡化。事件源于西蒙关于人类生存终极意义的疑问:西蒙担忧缺乏“宏观规划”的生命形态会使人类沦为蝼蚁,而工友们却只关注工作本身及其给自身带来的同伴情谊,并不在意其“高端设计”和终极目的^{[6]117}。这一分歧在西蒙随后参观码头的储粮仓库后愈发凸显。当目睹几百万袋粮食随意摊放在地,任由老鼠啃食,他当即再一次将进化论思想和盘托出,提出应按实际需求进口粮食,管制鼠害,同时启用卡车和气泵以提高工作效率。而工友们则不将鼠害放在眼里,认为“糟蹋是生活的一部分”^{[6]121};而使用机械作业则会使其“失去与喂养我们、赋予我们生命的食物接触”^{[6]122}。西蒙以进化论思想的核心进行反驳:任何事物都注定处于不断演进的变化中,而人力运粮“无非是摆出一副英雄主义的盛大场面而已”,毫无实质性作用^{[6]124}。西蒙的进化论伦理由此遮蔽了他人的主体意识。他自诩为救世主,斥工友们的观点为“反启蒙反开化”,而后者却质疑他为何如此相信“我们需要被挽救?”,事实是“我们谁也不蠢,是你所相信的那些花哨的推理太蠢,所以才给了你那种错误答案”^{[6]122}。显然,西蒙所

为是依据纯粹理性的标准来衡量他人,殊不知这根本行不通,因为“人类行为的某些特征是无法整整齐齐地被压缩在理性的框架之内的”^[8]。西蒙用自身的理性和进化论伦理的意识选择建构自我的唯一性,以证明自我强烈的主体性。这就忽视了他者作为另一个与我完全不同的主体的身份,他者所具备的他性是我所完全陌生的领域,自我必须对后者负责。柏拉图同样认为,人是有局限性的动物,人关于他人的知识过于破碎,不足以在此基础上形成准确的判断。西蒙试图证明理性是至高的,而他的努力最终无异于对自己的嘲讽。

是否应使用吊车作业以提高码头工作效率的争论止于西蒙为吊车所伤的悲剧。工友欧根尼奥由于操作吊车的技能不熟练,在作业时吊袋猛然坠落在码头前沿,将西蒙砸成重伤。躺在医院的西蒙在半梦半醒间竟“异乎寻常的清晰”地看见一位男孩在胯间蒙着一小块遮羞布,自鸣得意地骑在马上,“一手紧攥缰绳,另一只手指向高处做出帝王般的手势”,看着自己,似乎在说,“看着我的眼睛”^{[6]255}。西蒙将稚气未脱的大卫比作只用胯间一小块布遮羞的帝王,暗示着其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世界的偶合无序,唯有此才能把自己的关注投向他人,才能使自己真正学会如何“看着”(gaze)他人。正如西蒙对赶来看望他的欧根尼奥所言:“我错失了某些东西,我知道事情不该是这样,可就是这样了。”^{[6]256}西蒙的反思标志着他已经来到了由“迷惑”经过“关注”走向“善的真实”的朝圣之旅中的“关注”阶段,即对他人及周遭世界的一种具备稳定性的关注。从这层意义上看,“关注”是一种富有思想的、无私的沉思,而“关注”的目标正是把公正的、充满着爱的目光投向个体的真实。从道德上说,“关注”是意识的中心,它必然的对象也正是外部世界和个体的真实。

二、爱欲与性欲的较量

西蒙对文中三位主要女性安娜、埃琳娜和伊妮丝的爱欲和性欲成分的此消彼长是主导他走向善的关键因素。在重新安置中心初见安娜的西蒙即对前者表现出了强烈的爱欲和性欲。他为安娜娇美的面容所吸引,将其一举一动均臆想为“性挑逗的惯伎”^{[6]31}。安娜把西蒙展现出的欲望视为由美色引

发的自私的性欲:“你就是想把我夹得紧紧的,把你身上的某个东西塞进我的身体里”;而西蒙却将其美化为男人对“对方的一种奉献”^{[6]37}。可见,此时的西蒙还未认识到,爱欲是人向善永恒攀登的道路上不可替代的助推剂,而爱欲的衍生品——性欲则会对此产生阻碍作用。默多克借用柏拉图“洞喻”理论中囚犯走出山洞的比喻,认为爱欲缺失就是吸引人离开洞穴的磁力的缺失,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会将人停留在洞穴中的迷惑阶段,远离善的真实。而需要注意的是,若爱欲中的性欲占了上峰,则会使人的灵魂过度沉溺与自我,在主体和真正值得爱的人之间制造障碍。显然,此时的西蒙被笼罩在了这股由性欲诱惑制造出的迷雾中,从而阻碍了其关注其他个体的能力以及对自我的真正理解。因此,正如安娜所言,“一旦你发现我变成了善的化身,你就不会产生想对我动手动脚的念头了”^{[6]37},一旦西蒙真正领会了善的要义,便不会再被性欲的冲动所掌控,从而得以更为清晰地认识自身道德的缺失。

如果说与安娜的争执仅仅让西蒙产生了对自身关于爱欲与性欲观念的动摇,那么使其真正开始对此进行伦理反思的则是他与埃琳娜的情感交流。埃琳娜是西蒙搬入政府分配的东村公寓后结识的。初见埃琳娜时西蒙的反应与初见安娜时如出一辙,关注点仍旧停留在埃琳娜外在的容貌及身材上;不过,西蒙没有再与埃琳娜争论有关欲望的问题,而是直陈自身的困惑:“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个男人,而你是个女人。”^{[6]60}这一论断再次暴露了西蒙固有的思维模式:典型的两性关系就应由爱欲发展至性欲阶段。然而,最引发西蒙思考的关键点在于埃琳娜在两人性爱时的冷淡与麻木。西蒙追求的是通过“实质性的身体接触”——性爱带来的“更有实质意义的”激情,而非埃琳娜“死鱼似的毫无感觉的身体”所透露出的“友善”^{[6]61}。一次次的情感交锋引发了西蒙对自我的重新审视——问题是否源于“他非要将一己之愿(情欲与性爱)”置于他人的“普适的习俗(友善与仁慈)之上?”^{[6]61}在与埃琳娜逐渐交往的过程中,西蒙逐渐接受她的冷漠态度:“凡是她所给予的,他都尽可能怀着感恩之心欣然接受。”^{[6]67}可见,经历了一系列碰壁后,西蒙已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对他人

主体性的责任,唯我主义意识有所收敛。在性欲是否是追求终极之善的必要因素这一关键问题上,西蒙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转变。他和埃琳娜的情感最初以性欲为主导,二者间的性爱关系实则是西蒙测试自我能否摆脱乏味现实生活的满怀私欲的试验场,其结果当然以失败告终。逐渐地,西蒙的激情虽仍未在埃琳娜身上得以满足,却能充分尊重埃琳娜的感受,以感恩之心看待后者的主观意愿,这本身即是西蒙在无形中改变自身的偏激,并融入到新世界中的努力。正如埃琳娜指出,西蒙所谓的激情实质是某种贪得无厌的额外需求,换言之,即使他如愿得到了激情,也一定会很快产生新的欲求,从而感到新的缺失;因此,性欲不仅不是达到终极之善的必要因素,相反,它还会阻碍对善的追求。事实证明,西蒙与安娜、埃琳娜间的关系都是虚假的,因为他不能关注每个女人的不同特性,而是把自己的臆想强加在她们身上,把她们转变成了自身性爱实验的工具。正如但丁笔下鲍罗和弗兰尼斯卡的爱情,尽管二人永浴爱河,却看不到彼此的特性,都不把对方视为主体和中心。因此,对美的身体反应会将头脑束缚于错误的恋爱对象,从而削弱其对善的追求。

接下来,促使西蒙真正理解并实践其伦理反思成果的是文中最为关键的女性人物——伊妮丝。西蒙凭借直觉指定初次邂逅的伊妮丝为大卫的母亲,而非仅仅让她承担母亲的责任或娶她为妻,这既可视为其唯我主义意识控制下行为的最极端展现,却同时也是其认清爱欲、性欲与善的关系,向善的真实前进之路上的转折点。关于父亲在孩子成长中扮演的角色,西蒙表现出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他认为孩子当属其母,“父亲只是提供了一种抽象的理念”^{[6]112};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做父亲不只是去跟一个女人交媾,而做母亲也不只是给一个男人的精子提供容器”^{[6]204}。这一矛盾的表述实际源于他对父亲角色的双重理解:他坚信父亲只是抽象的存在,在孩子孕育的初期提供帮助后便可自行退出孩子的抚养过程,但同时也强调一个男人只要为孩子带来爱和关怀就可以“成为”后者的父亲。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即“生身”(real)父亲与“真正”(true)父亲间的天堑并非不可跨越,二者“在爱和关怀存在的前提下可以相互转

化”^[1]。西蒙、伊妮丝和大卫实际上正是构成了一个由无私的爱与关怀为纽带联结成的偶合家庭,由此观之,亲子间的血缘关系和父母间的性爱关系都不是组建家庭的必要条件。此后,当伊妮丝产生与恶棍达戈生孩子的想法时,埃琳娜建议西蒙赶在此之前主动向伊妮丝提出自己的意愿,西蒙当即答道:“我不是做父亲的材料。我被派定做叔叔了,不是父亲。”^{[6]204}西蒙此处所谓的父亲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生身”父亲。西蒙随后虽采纳了埃琳娜的建议,与伊妮丝挑明自己的想法,却没有得到任何明确回复。我们可以猜想,伊妮丝一定又一次冰冷地拒绝了他。这表明,对这个偶合家庭而言,性接触不仅不利,反而有害于其内部的和谐共生。换言之,西蒙最终认可了自己作为为大卫提供爱和关怀的“真正”父亲身份,同时避免成为其“生身”父亲。因此,只有以无私的爱与关怀为核心,且净化了肉体欲望的爱欲,才能达到善的真实。

三、神秘世界中的觉醒

艾勒克·博埃默指出库切后期小说反映了其“澳大利亚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9]。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小说内容充斥着对现实世界的朴素描绘,相反,神秘主义因素作为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主人公的伦理成长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构成世界的绝不仅仅是所谓的“事实”,即人类得以用科学加以验证的“正确结论”,换言之,摆在人类面前的是一个“超越事实”的现实^{[7]199}。埃利亚德认为:“在大多数当代的所谓巫术和神秘主义运动中,人们是怀着极大的热忱来实现这种向某一崇高地位的自我提升的。”^[10]然而,在《耶稣的童年》中,库切保留大量神秘主义的不仅不是为了提升自我,而是通过去除自我,为他人的主体性负责。

以诺维拉为代表的这一近似乌托邦的世界实则是人们生存的现实世界,它为西蒙的伦理成长提供了大环境和前提条件。对于每一个来到诺维拉的新人,过去的一切记忆被清除,被统一赋予新的名字,用一致的西班牙语交流。而在现实世界中,人们的名字也只是符号,可能因为父母的一念之差而改变;母语只是交流的工具,会因降生在不同的国

家和地区而大相径庭;甚至连人们降生在这一世界而非其他世界本身即是偶然的。若将这一规律缩小至家庭层面,新生儿与其父母的组合亦毫无规律可循,由此观之,西蒙凭借直觉将伊妮丝指定为大卫母亲的行为也并非表面上看来那样荒谬。正如库切在与保罗·奥斯特互通的书信中提到的:“偶然造就了我之为我的全部特性……如何解释我所生存的世界成为了一个极其简单却又无法解释的问题。”^[11]西蒙文末对搭便车的胡安也提到:“随机抽取的数字,随意取得的名字,以及随机而来的种种事件,充满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6]296}可见,库切构筑的这一颇具今世色彩的来生世界使西蒙对偶合无序世界的本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为其唯我主义思想逐渐转变为追求终极之善的行动提供了必要的大环境。

与此同时,大卫向西蒙演唱从埃琳娜处学得的《魔王》则折射出西蒙的绝对理性思维,为其尊重他人思维及其自主性,向善的真实迈进的朝圣提供了依据。曲中意欲得到孩子的隐身的魔王先用恭维和劝诱的语气给予孩子诸多许诺,而奉行理性之上的父亲却无法洞察孩子遭受的危险,不断用理智安抚着惊恐的孩子。随着魔王的手段逐渐由利诱转向威逼,孩子的惊恐和呼号不断升级,父亲也逐渐受到了孩子恐惧的感染,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正在与一股不可名状的强大势力作斗争。惊慌却又不通鬼神的父亲虽策马疾驰欲逃离危难,却不得不面对孩子丧生的悲惨结局。父亲之所以无法洞悉魔王的步步紧逼是因为“后者象征的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只能为天真无邪的孩童所感知,他们纯朴的生命本身即是大自然的一部分”^[12],从而能够与诸如魔王的自然伟力进行直接的心灵交流。可见,全诗展现的是大自然的神奇魔力与成人的理性世界间的博弈,最终以后者的惨败收场。显然,诗歌中三位角色间的关系可被视为小说中大卫、西蒙以及偶合无序世界三者关系的缩影,而整篇诗作正是小说故事发展的寓言:西蒙急切地寻找大卫的母亲,与策马疾驰的父亲同样紧急,而其对待大卫的态度也正是从起初的以自我为中心揣测和批判后者的数字神秘主义思想以及独特阅读理解方式开始,此后经过长期的磨合和阵痛,其绝对理性思维终于在世界原本的偶合无序前败下阵来,最终能够按照大卫的想法来与之

交流,洞悉世界,可见尊重客观世界的偶合无序及他人主体性的极端必要性。正如库切评价舒尔茨作品时所言,人自童年之后唯一要做的便是“一再回到原点,不断挣扎但没有结果”^{[13]76}。孩童的行为可被视为重返支配人类想象力的“神话学童年”的途径,这也从侧面给人们尊重孩童思维及其自主性,向终极之善迈进的朝圣提供了依据。

西蒙与大卫生活中的神秘因素对西蒙伦理成长的促进作用最终源于大卫自身的神秘特质,即他的数字神秘主义和奇特的理解方式。大卫始终恐惧会掉落到数字间隐形的裂缝中,但他坚持每个人最终都会掉进去^{[6]191}。库切曾在评价舒尔茨的作品时引用韦尼耶夫斯卡的诗句“那黑暗的基础,在母亲们中间”,认为文字终将解体,人们将“去到最底层”,即诗句中描写的地方;这意味着人们“离开母亲的乳房,进入黑暗的王国”^{[13]82}。《魔王》中隐形的魔王似乎是这黑暗王国的主宰,大卫不愿离开数字代表的母亲的乳汁,在恐惧的同时,他以孩童特有的自然性洞察到,所有人都必须掉落其中。履行成人世界既定规则的西蒙自然无法洞悉大卫的恐惧,仅仅将其视为“拒绝理解事物”的表现,这本身也是其唯我主义思维方式的体现。除此之外,异于常人的理解方式也是大卫的神秘之处。他认同《堂吉诃德》中主人公的视角,将风车视作后者所要征服的巨人;他相信英雄在蒙特西诺斯洞穴中所见的一切的真实存在,包括瀑布中冲泻下来的钻石,一队队身着绸缎长袍的贵妇等等。库切认为堂吉诃德实质上把人生当作虚构小说来过并且“有意识地出演一个角色”,以“抵抗面对现实时的幻灭感”,反映出其对“真实世界种种冥顽不化的复杂性”的厌恶^{[13]4-272}。急于逃离成人世界的大卫似乎可能读懂堂吉诃德疯癫表象后的深意,而西蒙却自以为是地称男孩的理解方式为“胡说一气”“犯傻”^{[6]179},这再次暴露了西蒙顽固的唯我主义思想。大卫上学后,奉行“班里只有一个权威,不能有两个”之信条,强制要求其接受特殊教育的班主任里奥先生和愿意站在大卫的角度思考其问题成因的心理专家奥特莎太太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西蒙对的伦理反思以及其对善的追求^{[6]244}。经过伦理反思后的他最终能够认识到大卫对堂吉诃德的理解只是代表了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面对工友欧根尼奥对伊妮丝宠溺孩子的指责,西蒙运用全新的视角劝解道,伊妮丝只是代表了将童年视作“日后幸福生活的基础”的教育思路^{[6]270},而“孩子和母亲之间的联系是神圣的”,所以他愿意遵从。最终,尽管并不完全支持伊妮丝的逃亡计划,他仍然在表达自身观点后,选择尊重她的想法,走上看不见未来的逃亡之路。

四、结束语

如果说库切前期小说在讨论主人公面临的伦理困境时多从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恶劣生存环境等外部宏大主题着眼,那么在入籍澳大利亚后的几部作品中,库切则将笔触指向人们的内心,探究人自身的道德缺陷与现代人伦理困境间的联系,并尝试探索可行的救赎之道。邵凌指出,库切在《慢人》及《凶年纪事》中讨论了现代人存在的“社会丛林伦理”“功利主义伦理”“无节制的消费主义伦理”等三种畸形伦理,并且提出了培育体现“爱与关怀”的“人际关系新伦理”的救赎之道^[14]。那么,在新作《耶稣的童年》中,库切则在上述两部小说的基础上挖掘出了唯我思想这一深埋在人性的更深处,并为此开出了新的药方:不断探索善的真实。小说呈现的是西蒙不断驱散唯我思想,向善的真实迈进的伦理成长过程。作为诺维拉新来者的西蒙在带有浓厚现世色彩的来生世界的神秘氛围中,经历了与工友思维的碰撞和“小教授”式的哲学辩论,经历了与安娜、埃琳娜和伊妮丝三位女性的情感纠葛,体验了此间爱欲与性欲的此消彼长以及与生活以大卫的数字神秘主义思维和阅读理解方式为代表的神秘主义因素的博弈,进化论伦理、爱欲与性欲与神秘主义因素三者相互交织、彼此渗透,共同促进了西蒙的伦理反思。西蒙由最初以自身的绝对理性强加在他人身上,到自觉为他人的主体性负责,成为理解偶合无序的世界,在追求善的真实的道路上不断迈进的新人。

参考文献:

- [1] Tajiri Y. Beyond the literary theme park; J. M. Coetzee's late style in *The Childhood of Jesus* [J].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016, 39(2): 72-88.
- [2] Wang E C. The problem of hospitality in J. M. Coetzee's *The Childhood of Jesus* [J].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014, 36(1): 35-44.
- [3] 王敬慧. 论父亲在孩童教育中的作用——读库切新作《耶稣的童年》有感[J]. *外国文学动态*, 2013(3): 25-27.
- [4] 何伟文. 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186.
- [5] Lévinas E. *Totality and Infinity* [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9: 104.
- [6] 库切. 耶稣的童年[M]. 文敏,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
- [7] Murdoch I. *Existentialists and Mystics: Writing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7.
- [8] Gindin J J. *Post-war British Fiction: New Accents and Attitudes*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190.
- [9] Boehmer E J M. Coetzee's Australian realism [C] // Cai S Q, Xie Y M.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oetzee Study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Research*.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3-21.
- [10] 米尔希·埃利亚德. 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M]. 宋立道, 鲁奇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0: 81.
- [11] Auster P, Coetzee J M. *Here and Now: Letters 2008—2011* [M]. New York: Viking, 2013: 208.
- [12] 陈壮鹰. 解读歌德谣曲风格[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28(5): 90-93.
- [13] 库切. 内心活动: 文学评论集(2000—2005) [C]. 黄灿然,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 4-272.
- [14] 邵凌. 库切作品与后现代文化景观[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6-191.

(编辑: 巩红晓)